



大家文存
粵源評論叢書

蕭

殷

集

傅修海 編

蕭殷集

SPM

南方
廣東人



大家文存
粤派评论丛书

萧

殷

集

傅修海
编

本项目受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殷集 / 傅修海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1

(粤派评论丛书)

ISBN 978-7-218-12166-6

I. ①萧… II. ①傅…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8073号

XIAO YIN JI

萧殷集

傅修海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段太彬

装帧设计: 张绮华

排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90千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学术顾问: 陈思和 温儒敏

总 主 编: 蒋述卓

执行主编: 陈剑晖 郭小东 贺仲明 林 岗 宋剑华

编 委: 陈剑晖 陈平原 陈桥生 陈小奇 古远清

郭小东 贺仲明 洪子诚 黄树森 黄天骥

黄伟宗 黄修己 黄子平 蒋述卓 林 岗

刘斯奋 饶芃子 宋剑华 谢有顺 徐南铁

许钦松 杨 义 张 柠

总 序

近百年来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评论”却极少被人提起。事实上，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还是文脉的历史传承，抑或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评论”都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百年粤派文学以及美术、音乐、戏剧、影视等评论为切入点，出版一套“粤派评论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评论”的价值，彰显粤派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评论的力量，让“粤派评论”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

出版这套丛书，有厚实、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

第一，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评论”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评论”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

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报》发表大量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的文章，风行一时。钟敬文措意于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粤派评论”的代表人物有黄秋耘、萧殷、梁宗岱等人。新时期以来，“粤派评论”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评论家。如饶芃子、黄树森、黄修己、黄伟宗、洪子诚、刘斯奋、杨义、温儒敏、谢望新、李钟声、古远清、蒋述卓、陈平原、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宋剑华、陈志红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艺评论阵营。如果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骥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评论”更是蔚为壮观。

第三，地理环境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评论”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评论”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粤派评论”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是“粤派评论”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评论”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自己的史观、史识

和史德。

第二，“粤派评论”注重文艺、文化评论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宽厚；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体现了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艺批评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的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的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互为表里。粤派评论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强调批评的实践性，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

我们认为，建构“粤派评论”，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它不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立场、一致追求趋向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因此，没有必要纠结“粤派评论”究竟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粤派评论”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即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却不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群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组织、指导编纂出版“粤派评论丛书”，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一次文化实践。我们坚信，扎根广东、辐射全国的“粤派评论”必将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其中一块最稳固的基石。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萧殷像

编者简介：

傅修海，1976年生，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曾任郑州大学直聘教授，现为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中国左翼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等研究。曾获评河南省委宣传部百名优秀社科理论人才、河南省优秀博士后、河南省高校哲社优秀学者、河南省高校哲社研究年度人物、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河南省教育厅高校青年骨干教师等，并曾获河南省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三等奖，连续两次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成果特等奖等。出版专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笔记》《瞿秋白与左翼文学的中国化进程》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转摘9篇，论文曾入围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终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官方网站曾刊发其专著的长篇英文学术书评。

导论：追逐者·追求者·探索者

——萧殷文论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傅修海

萧殷，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后改为萧殷，小说家、编辑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

1915年，萧殷出生于广东龙川县佗城镇，少孤家贫，初中毕业后在佗城小学任教，1932年开始从事业余写作。此后，在短短几年中，他曾以肖英、何远、黎政等笔名发表短篇小说30余篇。1936年，萧殷弃教往广州读艺术学院，参加“广州艺术协会”，发表多篇杂文，投入抗日学生运动。抗战军兴，萧殷又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防护团”，任战地记者。1938年，萧殷从武汉辗转到达延安，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员和中央艺校教员。1939年，萧殷调到张家口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1946夏接替丁玲担任《晋察冀日报》副刊主编。国共“和谈”期间，他还曾受命在北平主编《解放三日刊》，并兼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部主任。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同月18日《石家庄日报》创刊，随后萧殷便奉调到《石家庄日报》任职。

1949年2月11日，萧殷奉命调离，接受了进京办刊的任务，从此工作岗位由新闻界转向文艺界了。新中国成立后，萧殷把主要精力放在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他先后担任过《文艺报》编委、主编，《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兼职中央美术学院文学系教授。1960年，萧殷从北京调广

州，任中共中南局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作品》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第一至第三届理事。

萧殷著作丰富，著有短篇小说散文集《月夜》、文学评论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与习作者谈写作》《给文学青年》《鳞爪集》《习艺录》《萧殷文学评论集》《萧殷自选集》《萧殷文学书简》等。198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1983年8月3日，萧殷病逝于广州。

一

萧殷是从广东走向全国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从北京回归到广东的文学批评家。与此同时，萧殷还是有着丰富创作经验、报导与编辑经验的文学批评家，更是一位与新中国同甘共苦、一路同行的有着实际革命战斗经验的文学批评家。

正因为如此，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萧殷，他的文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色彩，更有着极为显著的实用和实践经验底蕴。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萧殷的第二个贡献是文学评论。他不是那种局限于学院圈子的高头讲章的论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大地的批评家。他坚信文学源于生活，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生，文学必须是真实的。重读《论文艺的真实性》《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等论集，可以见到他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和殷实的批评作风。”^①

具体而言，萧殷的文论可以从论域和形态两方面得到概括，这也是萧殷文论区别于其他文论家的鲜明特征。从论域上说，萧殷文论大致可分为总体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创作论和写作谈。从形态上说，萧殷文论除了一些长篇论文外，更大量呈现的是报刊编读往来形成的问答录、书籍的序跋文字以及远

^① 温儒敏：《萧殷先生的三大贡献》，载《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远未能收集完整的文学书简。这些现象，刘伟林先生早有论列，他说：“萧殷的评论，在形式上也不拘一格，有书评、有随笔、有书信、有序跋。把自己的理论、观点寓于多样的形式，自然地写出来。……萧殷为人作序，很注意理论评价。……萧殷给青年作家的集子作序……既热情肯定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作家的长处，又坦率地指出他的不足。这也是他的一贯的评论态度。”^①

当然，这种状况显然与萧殷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批评轨迹有关。萧殷不是职业的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但他却是始终在不同的职业生涯中心系文学的论者和评说者。他没有将批评职业化，却很热诚地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把对文学的热爱化入了每一个曾经战斗过的岗位和职业生涯中。这尽管有社会历史的不得已的原因，却更显出了萧殷始终的文学批评自觉。

作为一个独树一帜的文论家，萧殷无疑是他那一代人的时代语境下的文学批评家的典型。我们不能用过于学术和学理层面的规范要求他，但我们可以怀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尽量贴近语境和心境，去聆听他的文学发现与体悟，去辨析他的理论洞见与智慧闪现，去感受他的点点滴滴的融入与掘进。

如此，我们便可以在这个典型的时代语境下的文学思考者和批评家的文字中，感受到生长在实际革命层面的文学识见，体会艰难存留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文学情怀，进而理解他的真与美。一定程度上，或者也可以称得上是别一种善。

二

毫无疑问，作为当代中国某一段历史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代中国人的文学工作同行者和文学事业建设者的萧殷，他的文论是有着自己鲜明特点。当然，这也是那一代文学从业者文论上的典型特征。

萧殷曾经写过不少小说、散文和特写，也从事过新闻记者的工作，算得上是有着较为丰富创作经验的文论家。因此他的文论自然就能按照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来总结和提升，说到点子上，也想到了文学本身。这一点，便是萧殷

^① 刘伟林：《萧殷的文学评论》，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

文论的文学本位特征。

也就是说，萧殷文论从谈文学开始，以论文学和写作为鹄的。在一定意义上，萧殷文论的文学本位特征，也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写作主体意识浓烈的一个体现。萧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论文学、说文学、讨论文学的目的、基础和前提，核心都在于把一篇文字写好，把文章写好，把文章写得像文章，有文采，有文学意味。你只要看看他的论著的情形，《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与习作者谈写作》《给文学青年》《鳞爪集》《习艺录》《萧殷文学书简》……大量的文字都是在提点他人要怎么写，怎么样写才会好。尤其重要的是，萧殷在说这些道理的时候，他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而是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在与别人“谈”写作，讨论、对谈和切磋，这便是萧殷作为一名文学从业者的朴素态度，也是他对待文学批评的本位态度，更是他文论言语中自然而然追求的文学本位工作意识的呈现。

说起萧殷文论的文学本位，并不意味着萧殷文论没有理论深度，没有理论色彩。相反，这恰恰表明萧殷对于文学的理论性的融化态度和深度。如果说深入浅出和浅入深出是理论从业者的两种路径，那么萧殷的文论算是第三条道路——浅入浅出。但就在这两头的浅中，我们却反而看出萧殷独有的文论的深功夫。那就是萧殷文论的一个特征——理论普及性、现实性和原则性。而关于这个问题，刘伟林先生早有论列，他说：“萧殷的文学评论除上所论，还有许多特色。如所持观点的一贯性、评论逻辑的严密性、以具体作品说明理论的具体性、评论语言的通俗性，以及褒不溢美，罪不加过，实事求是的评论作风，等等。这些特点和作风的形成，不仅同他具有创作作品和欣赏作品的审美能力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他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他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强调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文学评论和创作……可能是由于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和长期患病的关系，使得他的评论比较缺少鸿篇巨制，又往往是指出存在问题的多，从正面给予理论上阐明的少。”^①“强烈的现实感和坚定的原则性，是其主要特色。他的评论文章、总是能抓住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中的一些主要倾向，从理

① 刘伟林：《萧殷的文学评论》，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



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生动具体的说明，从而使他的文学评论富有现实意义和战斗气息。”^①

萧殷文论的理论普及性、现实性和原则性，事实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由于萧殷长期担任党的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岗位，在他看来，无论是工作需要，还是自己的文论底色，都要求他必须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实功用，文学的社会功能。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文学本位的讨论，似乎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仿佛文学与社会剥离得越干净，分开得越远就越文学本位，越有文学的纯度，恨不得在二者中间塞进十万八千里的绝缘体才好。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纠正另一种偏见。

事实上，文学的社会性也正是文学本位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大地。因此，萧殷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本身，并不是与其强调文学本位矛盾的事情。但萧殷无法脱离和超越自己所在的历史语境，他仍旧过于单一、直接地理解着文学的功能。例如他对“伤痕文学”、“朦胧诗”等文学思潮的看法，便是自觉将自己作为文学战线领导者和文学批评者角色统一起来的实践。刘伟林曾有回忆说：“记得1980年11月，我到他的梅花村寓所拜访他时，在侃谈中，他表露出为当时有些青年诗人以写‘朦胧诗’为正路而担心，还敦促我们(与我同访的还有蔡运桂同志)撰文给予劝导，他还十分不主张一些大学文艺理论教师，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论和创作实际问题而进行经院式的教学和研究。”^②鉴于这种理论普及的现实需要和岗位角色，萧殷的文论往往便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创作实际出发，强调使文学评论与时代生活和作家的创作同步前进。

一方面，我们看到萧殷对于文学的由衷的热爱，他对文学自身执着的理解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萧殷对文学的理论力量的普及努力，对文学批评的现实性的注重，对文学参与现实社会政治历史进程的介意。前者固然是艺术、是美和远方，后者则是现实、是立足、是眼前，二者很难不发生为难与错位。萧殷自然也难于置身其外。更何况，萧殷自己就是彼时现实政治潮

① 刘伟林：《萧殷的文学评论》，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

② 刘伟林：《萧殷的文学评论》，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

流与历史进程的实践者与亲历者。当我们读到萧殷文论中不少类似的论说与周全时，萧殷文论的另一特征便是特别鲜明的，那就是萧殷始终注意到了自己文论中的原则性。

诚然，对于萧殷来说，其文论的原则性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看重的某种政治品格的代名词。他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强调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文学评论和创作。自然，萧殷文论的原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让他放弃这个原则。既然如此，萧殷文学观的基础便是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占据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文学反映论”，他说：“应该从生活出发，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反映生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不能停留在对于现象或偶然事物的反映上，而是要从中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①萧殷文论的这一特征，在讨论长篇小说《金沙洲》中是呈现得最为充分的一次。^②不难理解，以文学反映论为呈现的萧殷文论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恰恰是萧殷能成为一代人的当代文论家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家的重要人物的原因。

三

作为一代人的文论家代表，萧殷文论无论是文学本位意识也好，理论普及性、现实性和原则性也罢，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问题意识，尽管在萧殷所处的时代和语境下，解决问题的套路和模式是那么相对的一致。

萧殷的文论是针对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现象的，它们是生活事实中出现的实实在在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或者是切切实实发生的文学争议、讨论与分歧。萧殷文论的指向，是介入并主导讨论的走向，是切入并分析透彻问题与争议的所在，是归结问题的解释或解决的方案、方法与思路，尽管最终引向的却是早已规定好的某一个原则性的政治概念、哲学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共识。

① 萧殷：《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载《萧殷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② 萧殷：《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载《萧殷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但答案的非个人性和凝固性，并不能否认引向答案的过程的艰难与真诚。萧殷文论的问题意识的价值就在于此，他始终谨慎而自觉地希望自己从文学走向文学，以文学或者写作的思路引导问题的讨论属于文学或者艺术，再不济也应该是写作的。在那个语境里，即便如此的小步慢走式的文论掘进，也显然是难的。试看看《分析作品能“先政治、后艺术”吗？》《图解不是艺术方法》之类的文字，也应该对萧殷的稳健与勇敢多少生出些敬意罢。

然而即便如此，要概括萧殷文论的特色，与其从文论本身在论域分布上呈现出来的思想特征来凸显，事实上还不如从它在文体或文类形式上的观察更为直观简洁。

萧殷文论在形式上也不拘一格，有书评、有随笔、有书信、有序跋，这更形象生动地呈现出萧殷文论的现实性与问题性的特色，也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萧殷作为某一代人的文论家典型所真正从事的工作方式与贡献。肯为他人作嫁衣裳、肯为人师，一个“肯”字蕴含着多少赤忱而朴素的、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啊！而这恰恰就是萧殷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文学文化事业，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事业所能做出的最大的、难能可贵的贡献。天之骄子、不世英才、时代巨人固然可敬，但萧殷这种切切实实推动民族群体进步、推动他人前行的文学教育者和辅导者，同样不应该被忘记。

可以想见，“在40余年的工作中，曾经担任过八个报刊编辑”、“为编辑部写给文学青年的复信不计其数”、“大约用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看稿子写复信”^①的萧殷，他的文论展开方式是极为独特的，也是极富有生命高洁色彩的。也正因为如此，萧殷才得以多姿多彩的多渠道的文学批评方式，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深度而全方位地融入了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文学事业，用自己既具有普及性的通俗化的文学知识、写作知识开启了下一代人乃至下几代人的文学之门，拓宽了他们文学成才的大道和小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许许多多从业文学者的人生命运与现实道路。萧殷文论的这种实践品格，无私的“公谏”原则，有历史时代的规定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品格在。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程文超先生对萧殷文论和文学人生的前后两种评

① 陶萍：《萧殷文学书简·后记》，载《萧殷文学书简》，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述，以微妙的表述差异，深刻地传达出了他作为同样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对另一位前辈文论家惺惺相惜的理解、敬重与同情。在早先写作的一篇论文中，程文超显然对萧殷这一类“在追逐中失去”的人生历程和思想状况有所保留，认为“这也许是萧殷人生的宿命，却更是全部人生和文化的警示”。他写道：

一个热烈憧憬并用生命与热血去培育那憧憬的人，却在追求中走进了自己怎么也想不到的语境之中，而“走进”这种语境又并非没有自己的作用，这不能不令人感动，萧殷早年作品《疯子》里，有一个颇有意味的情节：弟弟追哥哥，为把他从疯癫之中救出来。这一情节的关键动作是：追。追的目的是得而救之，其结果却是：失去。因哥哥摔下了悬崖而使他彻底失去了哥哥。在追逐中失去。这一意象被青年萧殷为渲染悲惨而写了下来，不想却成了某种人生和文化问题的隐喻。这也许是萧殷人生的宿命，却更是全部人生和文化的警示。萧殷的“在追逐中失去”的人生历程并不是孤立的，他同他同代甚至几代的追求者、探索者走过了相同的路径。这便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的人生问题，它提交了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认真研究的“过程”。^①

然在另一个场合中，程文超却转而对萧殷这一类的文学评论家的“令人颤栗的人生过程”有了更体贴人情的判断，他说：

在无可回避的特定历史、文化过程中，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萧殷是杰出的，也是平凡的。重要的是，他思考过。他在思考中同祖国和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思考，作为一个行动，是萧殷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完成。对他来说，这就够了。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笔宝贵财富。这笔财富给我们诸多启示。拂去表层观照，今天重读萧殷的创作和萧殷的人生，要使我们从具体的人生过程去思

① 程文超：《谈萧殷的文学创作》，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3期。